



冷战后的日本与
中日关系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胡令远



区域公共产品与 日本的东亚功能性合作

冷战后的实践与启示

贺平◎著

冷战后的日本与
中日关系研究丛书

区域公共产品与 日本的东亚功能性合作

冷战后的实践与启示

贺平◎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区域公共产品与日本的东亚功能性合作:冷战后的
实践与启示/贺平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冷战后的日本与中日关系研究丛书)

ISBN 978-7-208-15936-5

I. ①区… II. ①贺… III. ①区域经济合作-国际合
作-日本、东亚-现代 IV. ①F131.35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32354 号

责任编辑 罗 俊

封面设计 零创意文化

冷战后的日本与中日关系研究丛书

区域公共产品与日本的东亚功能性合作

——冷战后的实践与启示

贺 平 著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26.5

插 页 2

字 数 387,000

版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936-5/D·3439

定 价 98.00 元

编委会名单

主编：胡令远

顾问：郑励志 林尚立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少普	王 勇	李 玉	李 薇	杨伯江	杨栋梁
吴心伯	吴寄南	胡令远	贺 平	徐 平	徐静波
高 兰	高 洪	韩东育	蔡建国	樊勇明	

丛书序

以冷战结束为分际，世界政治、经济之理念与格局均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塞缪尔·亨廷顿指出，21世纪国际政治角力的核心单位不再是国家，而是文明，是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是文化，各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民族主义的抬头，全球化、国际化浪潮的风起云涌及其逆流，新兴国家群体的快速发展，美国、欧洲、俄罗斯等进入多事之秋，实力相对走低，加之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凸显等等，一系列新要素催生了新的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版图。在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背后，作为推手的原动力究竟为何？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印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虽目下尚难给出答案，但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在人类发展历史进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却为我们昭示了不同的路径选择。

在以断言“冷战”结束标志历史终结而暴得大名的弗朗西斯·福山看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但反观冷战后国际政治的实践，历史并未沿着福山所指方向顺利前行，其结论或正在被终结。所以，近年福山也不得不由未终结的历史引申出他对未来的预测。其指出：全球政治未来的重要问题很简单，那就是谁的模式会奏效？如果“一带一路”倡议达到中国的预期，那么从印尼到波兰，整个欧亚大陆将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发生变化。对此，世人足可拭目以待。

弹指间冷战结束已近30年，旧秩序与新常态，现实与历史的交错与蝉

蛻，特别是近年，世界的各种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乃至瞠目结舌。由历史的巨眼以观之，这或许是一种征兆——所谓“风起于青萍之末”：冷战结束后，一方面伴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的巨大进步和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并投射到国家间乃至不同文明间的关系上。与此同时，世界政治权力观念的变化与权力转移也会成为伴生物。而具有古老文明并焕发出新的生机的中国的崛起，是冷战结束后世界与世推移的最大变量。百年变局的中国梦，首先是中国自身的变化外化为推动世界变革的内在逻辑与动力。中国曾经为人类与世界文明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但那既不是历史的绝唱也非余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造福人类，两者既互为表里，更并行不悖。

在战争与和平、全球治理等关乎人类命运与前途的重大历史与现实课题方面，当世界的目光更多地聚焦中国时，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与哲学命题，并辅之以“一带一路”作为践行平台，获得世界积极回应。其中，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不言而喻是摒弃冷战思维、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理念与路径选择。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一个历史性过程。其中，中国的一代学人，无疑对此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作为以日本和中日关系为术业的专门研究机构，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将以日本为案例，探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建设、实践路径等。此即出版本套丛书之初心。

冷战结束后，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等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对中日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逆转，中日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急剧而深刻的变化。面对这一历史性重大变局，需要两国发挥高度政治智慧。如何使中日关系平稳度过焦虑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达成新的平衡，从而行稳致远，这不仅事关两国人民的根本福祉与利益，同时对于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均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学界虽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冷战结束的日本及中日关系研究成果甚丰，但对冷战后近三十余年来的日本及中日关系的变化及未来趋势尚

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本套丛书拟从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诸方面，对冷战后的日本与中日关系做一系统梳理与分析，以求抛砖引玉之效。

本套丛书以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的专著为主体，以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心的博士后和培养的博士生之专著为辅构成系列。此外，对本中心具有特殊价值或纪念意义的论文集，也适当择取收录。

本套丛书延聘国内外资深专家学者为顾问和编委，惠予指导与监督。

2020年，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将迎来创建30周年，本套丛书也是向本中心发展历史上这一重要节点的献礼之作。

近30年来，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成长，离不开中日两国众多相关机构与友人的鼎力支持与指导，我们期待能以高水平高质量的系列研究成果，来副大家多年来给予的厚望与厚爱！

未来的中国不仅要在经济上继续造福世界，更要在思想和理念上为人类的进步做出应有贡献！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是为序。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

2018年6月吉日于复旦燕园

目 录

绪论	001
第一章 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与功能性合作	009
第一节 功能主义的思想沿革与理论承袭	010
第二节 新功能主义的修正与发展	021
第三节 外溢：功能主义与新功能主义的核心概念	033
第四节 理论争辩与政策启示	037
第五节 日本学界的功能主义与新功能主义研究	048
第二章 区域公共产品视角下的功能性合作	057
第一节 区域公共产品的理论与概念	057
第二节 功能性合作与日本“东亚共同体”诸构想	073
第三节 共同体构想下的东亚功能性合作实践	092
第三章 日本的东亚合作战略——历史与战略的视角	100
第一节 战略理念与思想渊源：从“吉田路线”到“中等强国论”	101
第二节 地缘政治制约、历史心理牵绊下的战略空间开拓	112
小结	126
第四章 日本的东亚合作战略——区域经济公共产品的视角	128
第一节 以贸易和投资为纽带，带动东亚经济的复兴与发展	129
第二节 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加强区域货币和金融合作	134

第三节	以 FTA 和 EPA 为基轴, 推进区域贸易自由化	137
第四节	区域公共产品与日本的东亚经济合作战略	143
小结		153
第五章	区域功能性合作中的善治经验——“一村一品”运动	156
第一节	作为地方善治经验的“一村一品”运动	157
第二节	作为地方外交和区域合作政策的“一村一品”运动	164
第三节	“一村一品”运动在亚洲的实践: 以泰国为例	174
第四节	作为区域公共产品的“一村一品”运动: 启示与反思	183
小结		192
第六章	区域功能性合作与日本的文化外交——以吴哥古迹保护修复为中心	194
第一节	日本参与吴哥古迹保护修复的组织与作为	195
第二节	文化遗产国际合作: 加权汇总的视角	201
第三节	文化外交与日本的东亚区域合作政策	206
小结		212
第七章	东盟粮食安全信息系统——日本的角色与作用	213
第一节	粮食安全及其对东盟的特殊意义	214
第二节	东盟粮食安全信息系统与日本的独特作用	219
第三节	日本实践的经验与启示	223
小结		228
第八章	东亚的粮食安全与大米储备——日本的实践与启示	229
第一节	原因与背景	230
第二节	机制进程及日本的作用	232
第三节	东盟与中日韩大米紧急储备的最终建立	236

第四节	日本实践的经验与启示	238
小结		244
第九章	从“合作”到“事业”：日本在东南亚的水务战略	246
第一节	援助视角下的水务“合作”	247
第二节	商业视角下的水务“事业”	256
第三节	水务战略背后的经济外交	271
小结		285
第十章	日本“国际健康外交”辨析	288
第一节	安倍政府的“国际健康外交”	290
第二节	“国际健康外交”具有鲜明的综合援助的色彩	299
第三节	“广义外交”和“多轨外交”视域下的“国际健康外交”	310
第四节	“国际健康外交”与日本的产业振兴战略	316
第五节	“健康”与“外交”之辨	321
小结		329
第十一章	日本实践的评价与启示	331
第一节	外化比较优势	331
第二节	多元主体协同	336
第三节	个体价值指归	338
第四节	从功能到认同	343
结语		349
参考文献		353
后记		406

图表目录

表 1-1	一体化理论的三个阶段	026
表 1-2	一体化进程不同路径的对比	028
表 1-3	欧洲的选择：一体化的路径	029
表 1-4	主要行为体目标对一体化进程的影响	032
表 1-5	高级政治功能与低级政治功能的分野	032
表 2-1	对国际公共产品中优先供给项目的各类界定	063
表 2-2	区域公共产品的种类、例证与供给方式	066
表 2-3	区域主义的概念比较	081
表 2-4	东亚共同体诸设想的比较	083
表 2-5	东亚一体化的进程	094
表 2-6	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的职能部门	096
表 3-1	日本历任首相在东南亚“政策演说”的关键词	114
表 3-2	日本的区域构想	115
表 3-3	“吉田主义”与“福田主义”的比较	115
表 3-4	历任日本首相的援助理念及其关键词	117
表 3-5	日本参议院调查会国际经济和外交委员会的专项调研报告	119
表 3-6	近年来日本首相在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演说	120
表 3-7	2000—2017 年七国（八国）集团峰会及日本的主要倡议	122
表 3-8	历次非洲发展东京会议（TICAD）及日本的主要倡议	125
表 4-1	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一体化构想的比较	140
表 4-2	东亚各自由贸易区对成员国 GDP 增长的效果	140
表 4-3	日本的区域经济合作协议	141

表 4-4	东亚各国出口贸易的指向	148
表 5-1	与“一村一品”运动相关的日本行政事业	159
表 5-2	“一村一品”运动的内容与运动主体	160
表 5-3	大分县基于“一村一品”运动三大原则的具体实践 及其成就	161
表 5-4	“一村一品”运动的内涵式发展	162
表 5-5	发展理念的进化	162
表 5-6	“大分一村一品国际交流推进协会”接收海外视察和 研修团体的基本情况	166
表 5-7	“大分一村一品国际交流推进协会”向海外派驻专家的 基本情况	166
表 5-8	各届“一村一品国际研讨会”概况	167
表 5-9	各届“一村一品研讨会”概况	173
表 5-10	泰国政府“地区领袖一村一品研修团”访日概况	177
表 5-11	“一村一品”项目产品的星级认定（截至 2004 年）	179
表 5-12	“一村一品之城”（OTOP City）展会概况	180
表 5-13	“一校一事业”项目的特色	182
表 5-14	日本在满足发展中国家发展需求中的地域性技术与诀窍	186
表 5-15	东盟各国与日本开展“一村一品”运动的基本 动因与路径	191
表 6-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保存日本信托基金对 吴哥古迹保护修复的资助项目	195
表 7-1	世界的大米生产、消费与储备	216
表 8-1	东南亚各国政府用以缓和粮食高价影响的政策措施	230
表 8-2	贸易与影响当地粮食价格的各种政策之间的互动	231
表 9-1	东亚国家在水问题领域的复合热点	249
表 9-2	水资源的问题维度、专项视角和行动要求	249
表 9-3	与水资源风险因素相关的公共政策	250

表 9-4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在上水道领域的援助实绩（2006—2015 年）	253
表 9-5	日本在东南亚开展水务合作的代表性案例	253
表 9-6	日本在东南亚开展水务“事业”的动因与表现	256
表 9-7	水环境治理中日本各个相关省厅的相互配合	269
表 9-8	日本的综合治水对策	272
表 9-9	发展援助项目中的“软性”要素	275
表 9-10	日本地方自治体在海外拓展水道事业的代表性案例	281
表 10-1	国际健康外交战略的五大具体措施	291
表 10-2	健康体系的构成要素	300
表 10-3	战后日本健康医疗政策的变迁	303
表 10-4	部分健康医疗领域的日本非政府组织及其主要活动	315
表 11-1	安全的四个象限	340
图 3-1	1970—2015 年日本对亚洲 ODA 支出总额变化	119
图 4-1	日本企业在东亚设立制造基地的目的	134
图 4-2	东亚的产业分工和贸易格局	148
图 9-1	2004—2015 年日本在水和卫生领域的援助实绩	252
图 9-2	世界水务战略地图	261
图 10-1	2004—2015 年日本在保健医疗领域的援助实绩	299
图 10-2	日本在健康领域的援助体系	301
图 10-3	JICA 青年海外协力队不同工作类别的派遣人数情况	315

绪 论

国别外交和区域合作是否具有某种人格，在探索一己实践、解决自身难题时择善而从、见贤思齐，将他者的长处引为参照乃至标杆，将其成败得失以兹镜鉴？人们一直在思索，欧洲等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体化实践与理论是否偏于一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东亚具有借鉴启示和指导意义？区域“合作”导致区域“和解”和区域“和平”，是一种必然、应然还是或然？区域“合作”又如何导向区域“和解”和区域“和平”？要在东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语境下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日本是断然难以回避的一个国家。经过国内外学人的孜孜探索，对于日本的区域外交研究固然已近乎汗牛充栋，但这些现实问题一日未解、难有公论，学理思考也就有了持续的动力乃至压力。这也正是本研究的意义所在。

为什么是东亚？

近年来，日本在非洲、拉美、中亚等地区的外交投入日渐提升，在若干领域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和实效，这使得“东亚”这一地域设定在日本研究中多少显得有些老生常谈，甚至黯然失色。但作为一个区域性大国，周边外交仍是日本的重中之重，研究的价值和探索的空间远未枯竭。

首先，相比其他地区，日本在东亚长期耕耘、用力甚勤，这一方面使其积淀下大量的外交实践和政策总结，另一方面又形成了某种“合作疲劳”和制度惰性，需要在区域交往中反躬自省、推陈出新。因此，日本外交的“东亚重心”是一个动态发展、不断调试的过程，对其研究也有历久弥新之感。

其次，“前现代国家”仍是东亚的主体。战后亚洲的大部分国家都是脱

离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新生政权，因此对于国家主权有着异乎寻常的珍视。无论是中印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万隆精神”都是这一价值规范的体现。1967年东盟成立后，逐渐形成了区域合作的所谓“东盟方式”：强调尊重国家主权，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采取协商一致的决策方式，尽可能采取灵活性和非正式的制度。^①这一方式不仅运用于东南亚内部，而且由于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特殊作用，事实上逐渐演变为地域覆盖面更广的“东亚方式”乃至“亚洲方式”。东盟地区论坛、东盟+3机制、东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APEC）都成为实践这一方式的机制和平台。

日本在东亚开展区域合作中所交织的历史纠葛、领土争端及由其导致的心理羁绊、战略掣肘在东亚以外的其他地区极大弱化甚至并不存在。也正因如此，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和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sm）等既有理论才与区域现实更显两相映照。

最后，中国也身处东亚，两国的区域行为不乏交叠乃至折冲。日本始终是最为重要邻国之一，对其区域外交作深入的政策梳理和理论提炼，也就有了更为现实的意义。经济自由主义、民主、人权等“普遍价值”以及诸多跨境问题的出现或恶化，从抽象和理念、具体和实际等两个方面对东亚的区域合作方式提出了越来越大的挑战。^②如果说前者仅仅涉及柬埔寨、东帝汶、缅甸等少数案例的话，那么后者则几乎将区域的所有国家裹挟其中。由此也造成了“物理性区域”与“功能性区域”的错位与乖离。在安全保障等领域，传统的强调国家主权的“物理性区域”仍占据重要位置，而在经济、环境等其他“非战略性”的领域和议题中，功能性的合作日益渗透到民族国家的边界内外。^③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上述矛盾又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发展，有时甚至远远超出理论推导和政策判断的预期。在这个意义

① 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② 大庭三枝「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の進展とアジア地域主義の変容」、『国際政治』、第158号、2009年12月、75—88頁。

③ 李鍾元「東アジア地域論の現状と課題」、『国際政治』、第135号、2004年3月、2頁。

上,对别国的考察、对历史的梳理、对理论的探索,对本国、对当下、对实践也就有了突出的政策意义。

为什么是功能性合作?

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是国际关系诸多理论中的两个分支,前者着眼于世界和平,而后者则更为关注区域一体化。两者相结合,对于观察和解释东亚合作进程和日本外交,表现出异乎其他理论的特性与优势。这一理论有助于我们思考:日本在东亚供给区域公共产品和参与功能性合作的基本动因何在?其战略初衷与实施效果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相一致?这些功能性的区域合作行为对于日本的东亚外交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功能主义从其诞生之初就受到批评和质疑,认为其忽视了“高级政治”,将国际权力和威望、战争与和平、武力与联盟等一系列重要因素都隐含在“互动”(interaction)、“任务拓展”(task expansion)、“福利最大化”(welfare maximization)等“世俗的”概念之中。^①本研究在借用新旧功能主义时,并不刻意将这些“高级政治”的因素“找回来”,它们始终未曾离席:任何一个正视东亚国际政治现实的研究都无法回避“高级政治”,强调这一旨趣的研究无论是从量还是从质上来说,也都已蔚为可观。本研究期待的是,在将这些“高级政治”因素视为既定条件的前提下,在承认新旧功能主义理论缺陷的同时,探寻功能性合作对于区域和平和繁荣的意义。

回顾战后历史特别是冷战后至今的近三十年,在种种外交宣示和政策实践背后,不难发现长期萦绕日本外交的一个悖论。一方面是军事、安全等所谓“高级政治”领域的历史束缚和现实制约,另一方面则是高速增长长期之后综合国力的蒸蒸日上和傲视群雄,以及构建“普通国家”或曰“正常国家”的冲动。在这一约束和激励的共同作用下,如何拓展战略空间成为战后

① Ernst B. Haas, "The Study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Reflections on the Joy and Anguish of Pretheorizing," in Leon N. Lindberg and Stuart A. Scheingold eds.,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25.

历届日本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功能性合作和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由此成为日本面临上述困境的应对之道。

从战后日本的实践来看,通过功能性合作提供区域公共产品并不是地区版的“霸权稳定论”的再现。长期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为战后日本留下了沉重的政治“负资产”,“大东亚共荣圈”等军国主义理念和实践在东亚各国仍是痛苦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极易被某种现实的类比或联想所唤醒。尽管如此或恰恰因为如此,区域功能性合作客观上有助于日本改善本国的国际形象、增强区域凝聚力和亲和力乃至谋求在特定功能领域的影响力。

当然,功能性合作不能包治百病,也不是彻底解决地区结构性问题的“灵丹妙药”。正如不少学者所断言的,如果没有突破性的政治进展和战略决断,功能性合作的实际和远期功效值得怀疑,“政经分离”的原则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单纯凭借功能性合作无望解决历史问题、主权纷争等困扰东亚各国的痼疾。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现实也部分印证了这一判断:经贸等领域的互利共赢、功能性合作的渐次开展,仍不时受到政治安全等因素的干扰,双边关系起伏不定,领土或海洋权益争端频发,权力政治的弥散和大国博弈的挤压使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裹挟其中。

如果把一体化视为合作的高级形态,那么,“区域一体化”与“区域合作”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一对可以互换的概念。在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机构中,区域合作和一体化(RCI)也往往合二为一、相提并论。纵观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的理论演进,既有对现状描述和解释的成分,也不乏对于未来理想的预测性分析。正视现实、脚踏实地,谈“合作”而不是谈“一体化”对于当前一体化水平远低于欧洲的东亚而言,或许更具有意义。同时,任何一种国际关系理论对现实的映照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复杂现实与精要理论之间的参差,非但没有抹杀各种“主义”的价值,而且为其提供了进一步修正和完善的鲜活素材。

“区域公共产品”是本研究涉及的另一个主要概念,对其阐释在第二章中将着重展开。在相当程度上,“区域公共产品”的概念是一个描述性的借喻,与功能主义形成了某种“虚实结合”的意向互补。从概念阐述和理论适